

绪论 社会发展观的反思

第一节 西方社会发展观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一、概念区分和研究策略

首先，有必要简单地区分以下三个概念：“社会发展观”、“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对这三个概念要给出严格的定义本来就很难，在这里我们也不想陷于概念的讨论，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想稍微明确一下对它们的“用法”。

“发展研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它既可以指发展理论的研究，也可以指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发展问题乃至具体发展项目的研究。但在时间上这个词倒是有比较明确的限制，它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起初，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如何尽快实现经济增

长的问题；后来发现，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面临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而就全球而言，人口、粮食、资源、贫困等问题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现实发展和未来前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遂成为当代的一大主题。

“社会发展理论”顾名思义，主要指“理论”研究，尤其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如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哲学等等。但它与“发展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它的时间范围要大得多。社会发展理论不仅指当代关于发展问题的诸学科，也指这些学科（理论）的基础和来源。如发展社会学自然要把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等的著作当作理论基石和经典，发展经济学甚至会把自已的理论起点定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①。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理论”的时间范围不仅不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不限于本世纪，大体上，它以各个关于发展的具体学科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为自己的时间范围。当然，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还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事情。

广义地说，“社会发 展观”也是“理论”，也属于“社会发展理论”的范畴，但“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指各具体学科，而“社会发 展观”则主要指哲学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但界限也不能划得太清楚。各个具体学科有时讨论的若干观念、基本观点和看法，也是“观”，如公平观、平等观，一些具体问题所涉及到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等等，也具有“发 展观”的意义。如果可以把“社会发 展观”区别为狭义和广义的话，那末这些具体学科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到或引伸出的“发 展

^①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观”问题，属于狭义的社会发展观，而广义的社会发展观则与社会进化观、社会运动观、社会变迁观没有多少区别了，它是把社会作为一种基本运动方式看待，并关注它的起源、形成、特征和运动规律。

在做了以上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确本书的论域：（1）在研究层次上，本书是立足于“发展研究”来观照“发展观”问题，亦即从回答现实具体问题的需要出发去讨论发展观，又从发展观的“高度”观照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它既非纯粹的哲学探讨，也非纯粹的具体问题研究，而是力图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做一种纵向的沟通。

（2）在横向上，本书不拟完整全面地讨论发展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只选择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重点问题加以讨论。正是为了做出这种选择，我们才需要讨论所谓“对西方发展观的挑战”和中国社会发展观在当前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但对重点问题也把它置于整体背景下进行讨论，而在关照到全面性要求时，又不追求面面俱到。这也算作在点与面之间所做的一种沟通吧。

（3）本书虽然广泛涉及到中国古代发展观、近代发展观和现代发展观，但又不侧重于历史脉络的勾勒和各家各派学说的阐述，因此不敢言“史”；本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观的几个主要特征，从几个方面对不同时期发展观的内容做了论述，但并未专门致力于对某些问题的系统探讨，因此也不是一篇篇专论的汇集而是试图在“史”与“论”之间寻求某种结合。在“结合”过程中畸轻畸重的情况是常有的。

二、中国的“发展研究”与西方社会发展观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观是中国人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当然这里也包括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西方社会发展观是西

方人对西方发展问题的思考，这里也包括思考西方与中国、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也就无所谓“挑战”与否的问题，相互尊重、相互启发，取长补短、交汇融通，不就很好吗？的确，这种非挑战性的一面始终是存在的。所谓“挑战”，主要是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下：一是西方人用他们的发展观来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所谓“发展研究”本来就是由西方学者搞起来的，其中，自然要体现西方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这没有什么奇怪。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切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用西方的理论来框定、裁剪、歪曲中国的实际，更有甚者，认为中国只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走过的路，中国的事实也必须适合西方的概念，那末，中国的事实就要说话了。另一种情况是中国人搬用西方理论，这本来也不奇怪。中国近代有较长的时间很不争气，在发展问题上落后于西方，落伍者向先进者学习，本是常理。有许多理论，有许多学科，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没有，就更要向人家学。问题在于，如果奉西方理论为主臬，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发展实际上，那末，中国的事实也要说话了。“说话”，也就是中国发展的事实和中国人的实际经验，对西方理论的检验、审视和判别，这就是“挑战”。无非是看一看哪一些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解释力的，哪一些是不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即使不符合，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不符合中国实际，还可能符合别国实际，至少它在西方环境下能够形成、能够发生影响，就总有它的根据。所以，所谓“挑战”，其实也平常。任何理论，都要准备接受挑战，一个是其它理论的“挑战”，一个是新的事实的检验。不能解释新事实，就暴露了理论的局限性，被限定了适用性范围，这是真正无可辩驳的“挑战”同时也是理论难以避免的“命运”。

我们在这里，是用中国的“发展研究”检视西方社会发展

观，看一看哪些问题是它不能很好回答或根本不能回答的，这就具有“挑战”的意味了。如果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即如果按照西方理论所作出的“预言”与中国实际恰恰相反，也就算是比较严峻的挑战了。

令世人瞩目的是，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奇迹。1979—1994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1991—1995 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达 12%。预计到本世纪末，增长速度仍可保持在 8% 左右。在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到本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初步建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比 1980 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正如 1995 年日内瓦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主席 P·施佩尔蒂博士所说：“下个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将是中国龙的崛起。……十年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在数量上将是最强大的。因而，在欧罗巴的 19 世纪和美利坚的 20 世纪之后，21 世纪将属于亚细亚，并且首先是中国的时代”^①。

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对于中国奇迹为什么能够发生，它的外在条件和内在逻辑是什么，也有许多评论和解释，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数解释未脱出西方发展观的框架，运用这个框架解释中国发展的实际，其合理性和解释力如何？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对此主要是提出质疑，而不想得出绝对的结论。一是由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还缺乏研究；二是由于中国的奇迹虽然从 1978 年算起至今已有 18 年，但毕竟为时尚短，而且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解决的难题还很多，待这些难题真正解决了，中国真正发达起来

了，再对西方发展观下个定论也不为迟。

改革开放 18 年来的中国实际对西方发展观提出了哪些挑战？在“观”的层面上，我们试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1. 唯工业主义

任何一个想要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努力推进工业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现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强国，后起的东亚现代化新秀也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都突出了“工业化”的地位，以致于“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往往被强调到可以和“现代化”同义的程度，现代化被等同于工业化，农业的发展目标也是实现“农业工业化”。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工业与农业、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那种唯“工业”独尊、唯“工业”是举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唯工业主义。

中国 12 亿人口，有 9 亿农民，实现工业化的任务非常艰巨，集中力量大办工业，力争工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农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化浪潮的几次受挫却不是对工业重视不够，而是对农业重视不够。对我国来说，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比例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投资比例问题、产业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政治大局和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别的国家可以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换取工业的发展，我们不能；别的国家没有粮食问题、土地问题的强约束，我们却有。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是看农业的支撑力。40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反复验证，我国工农业的增长比例大体上以 2.5 : 1 为适宜，如果这个比例严重失调，比如，达到 4 : 1 或 5 : 1，甚至更高，那末高速的工业增长不仅难以维持，还有可能酿成危机。据统计，1984—1993 年，我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 1.51%，粮食年增长率仅为 1.34%，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速度。而 1980—1994

年，我国耕地已净减 7500 万亩，其中，仅 1994 年就减少 1400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已降到警戒线以下。我国的工业化所面临的这些强约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用牺牲农业、摧毁农业的方式谋求工业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必须走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再反过来扶持农业、反哺农业，那末我国却必须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就注意爱护农业、扶持农业，把农业发展视为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一大特色。

是不是唯独工业才是现代化的标志？其实，唯工业主义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偏狭的观念反映。人们高度评价工业革命对于开启现代文明的作用，以致于把现代文明称为“工业文明”。但是，农业革命对于现代文明的形成同样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大约在一万一千年前发生的第一次农业革命，打破了狩猎、采集方法对食物供给的限制，将 10%—20% 的劳动力从直接的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才有随之而来的第一批城市的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W·福格尔认为，公元 1700 年第二次农业革命以后，粮食生产技术取得了比第一次农业革命大得多的进步，才有工业革命的产生，尽管 18 世纪在制造业、交通、贸易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比农业技术突破更为夺目，但没有第二次农业革命，也就没有支撑近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必要条件。在西欧历史上，工业革命的光环使得农业革命显得黯然失色，但绝不等于在未来的世纪，在其它地域，农业革命就不可能在科技革命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支持下重塑辉煌。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所谓“农业大省，财政穷省”的情况，因而长期存在着资金投入向效益高的工业部门倾斜的偏向，但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在这个表面的效益帐后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道理：没有强大的、先进的农

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先进的工业；没有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实现现代化。

2. 片面增长主义

一般所说的经济增长，当然是人类正常追求的目标，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都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共同刺激，工农业总产值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甚至出现了“增长热”和“增长狂”。西方国家的增长理论被奉为普遍有效的通则，西方国家的“经济成长阶段”也被说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步步效法的通途。于是，增长就是一切，增长可以代替一切，增长可以不顾一切的倾向到处蔓延，它造成了增长与资源、增长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之间的相互对立和严重危机，这种倾向，就是“片面增长主义”。

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落后了，多少年来吃尽了落后之苦，急欲奋起直追，现在终于有了适宜的国内外环境，取得了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一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大国，创造了增长的奇迹，国人高兴，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不仅要求快速增长，还要求持续增长，协调发展，为达此目的，就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协调，还要保持社会稳定、社会公正，要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法制建设、道德建设的协调和同步。一句话，我们不是不要增长，而是真要“增长”，而真要增长、真要持续增长，就必须防止和克服片面增长主义，不能为增长而增长、为速度而速度，只顾一时的增长，只顾经济的增长，而要树立全面发展观、整体发展观，实现协调的增长、协调的发展。这当然是难度很大的，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否则，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旦出了问题，增长就难以持续。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对片面发展观的克服和超越。西方发展模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和矛盾，西方国家自己已经在反思。不过，由于它们富裕了，可以花钱治理污染，可以节省自己国家的资源，从别的国家购买资源，甚至可以向别国转嫁污染，保护自己的环境。那末发展中国家呢？难道不应该警醒，不应当想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还要去盲目追随西方模式吗？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 1992 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上说：“历史告诉我们：工业革命之后流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难以为继。这种模式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虽然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有时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未能保护好环境。”¹

中国既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近 10 多年来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自然深切感受到了片面增长和全面发展的矛盾，激起了对持续发展的期盼和忧虑。中国政府在世界环发大会之后，很快就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做出了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承诺，这是明智的决策。“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发 展道路和模式问题。显然，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不可能用停滞发展的办法，也不可能脱离发展，只有通过发展，走协调发展之路。

¹ 引自《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宋健同志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载《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 页。

3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它涉及到生产与消费、生活与消费、物质消费与精神价值、消费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等的关系领域。凡是在以上关系中，过分地夸大消费的作用、不适当地突出消费的地位和价值，均可视为“消费主义”。仅就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而论，我们把那种视消费特别是无限制的消费为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过度刺激消费欲望，不顾环境和资源条件，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不适当地追求消费的倾向，称为“消费主义”。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老话题，在一般的意义上讲，生产和消费是相互统一的，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在一般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上毋需谈论消费主义。但是，西方发展模式所体现的却不是一般的生产和消费关系，而是同时表现为一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殊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意味着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为追求消费而无限膨胀的占有和浪费。以美国为例，它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5%，每年却耗费世界 25% 的商业能源。只占世界人口约 20% 的工业化国家，能源和资源消耗量却占世界的 70% 以上。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式，被称为“生态破坏性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而列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球资本主义文化”，被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称为“消费主义文化”。他写道：“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郑重地宣称，生活的意义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商品之中。因此，消费就是生命的全部活力所在，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不停地消费。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作为经济存在和政治存在的观念不再具有意义，……男人和女人仅仅是消费者。对在一个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全球体系中的‘普通成员’来说，

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为消费者提供资源，政治活动的意义在于保证消费的条件得以维持。”

在消费主义文化笼罩下，广告等传播和宣传媒介以及形形色色、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推销、促销、骗销手段，制造了现实与不现实的、正当与不正当的、良性与恶性的消费“需求”，贫困边远地区的人们追求和模仿富裕地区的消费方式，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向往和羡慕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于是，以中国为例，彩电和寻呼机等的人均拥有量急剧上升，某些地区和城市的彩电尤其是超大屏幕彩电拥有量甚至比发达的西欧国家都高。在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这些年来涌动着不可抑制的、相互攀比的盖房热，从砖房到水泥板房，从平房到楼房，从普通楼房到别墅式楼房，从低档装修的别墅到豪华式别墅，10年之间上了几个台阶，拆了盖、盖了拆，不问实际需要，不顾实际发展水平，差不多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花到住房上了，并且津津乐道，相互炫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吃喝风刮来刮去，越刮越凶，高档再高档，奢侈再奢侈，花样翻新之快，旁门别道之奇，把一个所谓“中国饮食文化”炒到了山吃海喝、昏吃昏喝，必欲喝醉喝死、吃垮吃穷而不可止的非理性高度。

4. 进化主义

与消费主义不同，进化主义的形成和扩散是依傍于自然科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生物进化论的，这就给人一种仿佛它具有科学上的依据的印象。其实，生物进化论是一回事，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进化主义及其在发展观上的表现则是另一回事。当然不能说二者没有联系，自然科学的重大成果往往会对社会思潮发生影响，如牛顿力学之于机械主义，实验科学之于

①L· 斯科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6页。

经验主义等等，但科学理论和社会思潮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功能上都相去甚远，对此无需赘言。

进化主义其实是根源于一种社会需要和利益偏好。再没有比宣称某种事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令人难置一词的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由此获得了“天然合理”的“证明”。再没有比声称西方发展模式符合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更能支持“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优越论”了。很显然，由于这种社会需要和利益驱动，进化论的概念就被采摘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装饰材料。

所谓“进化主义”发展观，实质就是如此，但其理论形态，在不同学科中却有不同表现。就发展社会学而言，形成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其基础主要就是进化主义。“现代化理论”把“现代社会”等同于西方社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例如帕森斯的所谓进化“阶段论”，就是把西方社会看作进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其它社会则根据与西方社会差异的大小，依次排列，差异越大，就被认为进化程度（亦即现代化程度）越低。这种理论必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西方社会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唯西方模式独尊，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社会走过的老路。而这种所谓阶段，据说又是不可逾越的，并且是线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接受西方文化的传播（侵略），丢弃和摧毁自己的传统，才有可能求得发展，才有可能现代化。几十年来，这种建基于进化主义之上的现代化理论，不仅被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实践经验所驳斥，在理论上也被反驳和超越了。

东亚的崛起之所以引起世人关注，主要不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不亚于西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单从增长速度看，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过或也可能有或长或短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东亚经验更令人注目的是，它表明，现代社会并非

只有西方社会一种模式，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化这一种途径，东方文化也可以创造出现代文明的新形式，各个民族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独立的创新，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挑战，是实践的挑战。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发展观的特点

随着亚洲的崛起，当世人把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时，不仅注意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特点，注意到东方文化的特点，更注意到东方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尤为惹人注目的，就是中国社会发展观的特点。

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特征，是两极对立。要么是传统社会，要么是现代社会；要么是农业社会，要么是工业社会。搞现代化就要“消灭”传统，搞工业就要削弱农业。搞现代化固然要追求经济增长，但把增长和环境对立起来，把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对立起来，只要增长就不顾公平与否、不顾稳定与否，也就陷入极端。追求增加消费，本来无可厚非，但把消费和生产、消费和积累、消费和发展对立起来，消费至上，就走向了反面。“唯工业主义”、“片面增长主义”、“消费主义”、“进化主义”，究其根源，盖出于西方式的所谓“二分法”，即两极对立。

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如同中国社会发展史一样，有其辉煌的一面，也有固有的弱点。就发展观研究而言，很明显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没有那么突出、那么系统、那么强劲的“发展”概念。兴衰治乱，分分合合，因而其发展观奥妙变化，却难以理出清晰的线索。然而，与西方社会发展观以“两极对立”为特征恰好相反，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是以整体和谐为特征的。不是不讲矛盾，不讲对立，而是在统一中把握对立，

不走极端，允执其中。讲和谐，讲协调，也都是相对的，动态的。

这种辩证法，又是浑然一体的，是处于学科分化以前的一种状态。而现代讨论“发展问题”是在学科分化基础上进行的。在中国传统的概念系统中，并没有与经济、政治、伦理、法律等等区别得很清楚的“社会”概念，同理，也就没有与变易、运行等等区分得很清楚的“发展”概念。在中国社会思想中，关于发展的观念是与变易观、整体观、协调观密不可分的，并且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特点。如果不从中国自己的概念系统来看，而是硬套西方现代的“发展”概念，那就有可能在研究中国发展观时走向虚无主义。反之，如果完全不顾在学科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发展”概念，纯粹沿用中国传统的概念，那也无法与现代关于发展的研究相衔接。

考虑到以上两点，即一方面我们为了便于同西方社会发展观相对照，从而突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又顾及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概念上的特点，我们在简述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观时，突出了整体论、协调论、变易论的内容。

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古今，绵延不断，影响至深，构成了中国式的整体论的内核、特色和基础。“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天人一物”、“天人一体”天与人是一个整体，由天人关系而及人伦关系，而及价值关系，而及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关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本体论思想，讲发展也好，讲变化也好，都是奠基子、发源于这个整体论基础的。

所谓“整体”，当然不是毫无区分，说是浑然一体，实际也有区分，天人之间有区分，人与人、人与社会也有区分。不过这种区分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沟通、相互和合，相互统一。在这一根本点上，不论是儒家、道家，不论是古代、近代，都是高度一致的。尽管儒家重视人文，主张“天

合一于天”，而道家重视自然，主张“无以人灭天”，要求“人合一于天”，但毕竟都讲“合一”。这一思想，迥异于那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把社会视为自然界之外的独立领域的西方社会发展观。

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建立了人伦型社会，形成了以人伦网络为依托的整体发展的观念。而调适人伦网络的价值原则就是“仁”，在这个意义上，“整体”并非与“个人”相对立，并没有淹没人，而是突出地强调把人当作人来对待，不过这个“人”是“仁”，是处于与他人关系中的人，是“复数”，不是孤立的个人，是作为整体的一员而存在的。所以，人的发展是在整体中实现的，是一种整体现象，在这里，却又见到了与西方近代的孤立的个人，个人至上的观念不同之处。

社会的整体发展，并不是社会的每一个分子单独发展的“集合”，而是一种整体状态的改善，整体优化，整体内部的协和，以及环境的统一。所以，这种整体发展观主要是协调论。怎么协调？人伦社会必须讲究尊卑贵贱的差别秩序，秩序很重要，不然就乱了套，这就要有一种制度保障，人伦社会规范人们行动、位置和精神的主要手段是礼乐。被人称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学家”的荀子，专门著有《礼论》《乐论》，认为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别异”，乐的社会作用在于“合同”。“别异”就是分别和确定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合同”就是在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如果说礼乐是协调人伦关系的基本制度，那末惠民则是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措施。所谓惠民，就是不与民争利，给人民应得的利益，以此为原则处理民、国、君的三者关系。显然，这里体现了民本思想。进一步说，在客观的层面说，主要是强调德化，即不是依赖刑罚，而是依靠道德和礼义的感化；在微观的层面说，对个人主要是强调修身；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上,则强调“参赞”,即“参天地”;“赞化育”,人参与自然界的化育过程而达至生态平衡。

以上,整体论,讲的是社会发展的本体;协调论,讲的是社会发展的状态,强调社会发展是以各个方面相互协调为条件的,发展主要不是向外扩张,而是自我完善,整体内在状态的改善。这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发展观不同于西方发展观的特点。那末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变易。在变易论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发展过程的理解。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论,内容极为丰富。自古以来,先人们就是用动态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宇宙、看人生、看社会的。变易的观点体现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社会思想等各种观念体系之中,一时难以尽述。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变易论具有既朴素又深邃的辩证性。讲“变”不是一味地“变”,不是什么都变,而是有变、有常;“权”与“经”相对而言。规律就是变中之不变,所以讲变,但又有规可循的,可以把握的,不是无可遵循,无法把握的。道之常即为“经”,道之变则为“权”,变而有常,变也是常,经与权相统一,常与变相统一;“合之于一而不疑”。“因”与“革”也是统一的;“因”是继承,“革”是创新。虽然有人“贵因”,有人强调变革,但并不否认因与革的辩证联系。“述”与“作”也是这样。“述”是已有传统的转述,“作”是创作,新见。作为一种文化发展模式,有述,则有文化的继承,传统的延续和知识的累积,有作才有辨疑,才有批判,才有创造。虽然述作型文化发展模式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程度的偏差,但中华文化延绵不断,不断革故鼎新,而又蔚为传统,其中自有其独到的发展机制。

“经权”、“因革”、“述作”仅仅是用以说明“变易论”特点的一些例证,远非变易论的全部内容,对于说明中国社会发展观更不过是全豹之一斑。同样,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观有几千年的

积累和发展，举出整体之为发展本体，协调之为发展状态，变易之为发展本质，不过是挑选此三者作为讨论的楔口而已，只是以此作为中国社会发展观研究的初步尝试。

自近代以来，中西发展观发生了剧烈的撞击。中国社会，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可能照老样子那样走下去了，传统的社会发展观也遇到了西方发展观的有力挑战。自此之后，实际上已不可能就中国论中国了，必须就世界论中国，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出发看中国。这反映在发展观上，就是长期、反复、激烈而深刻的“发展取向”之争。这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

远的就不说了，例如，早在明朝末期，随着西方算学和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就发生了“会通超胜”与“西学东源”的不同态度和取向。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睁眼看世界不行了，不学习西方也不行了，正如北京大学已故历史学教授罗荣渠所说，自 1840 年以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纪录。从更深层上看，这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与危机步步深化的曲折反映。”¹⁾

这一时期，在社会发展观上，也可以说西方差不多的学说学派，理论模式也都在中国登场过，发生过或大或小、或长期或短时的影响。其中尤以中西体用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工业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最为激烈。而“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没有找到具有中

1 罗荣渠：《跨世纪的沉思——对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 期，第 10 页。